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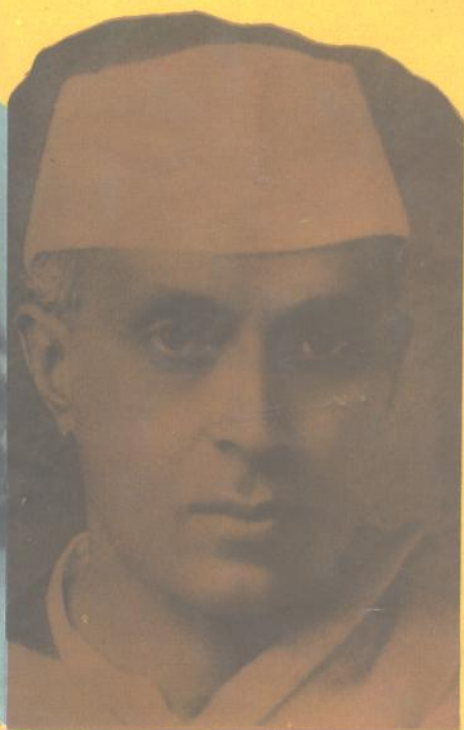
尼赫鲁家书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书信选集 1922—39

F R E E D O M ' S

LETTERS
BETWEEN
INDIRA GANDHI
AND
JAWAHARLAL
NEHRU
1922—39

D A U G H T E R



索妮娅·甘地 编
庞新华译 辛工 校

河南人民出版社

K 351.43

G 020

尼赫鲁家书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书信选集 1922—39

索妮娅·甘地编 庞新华译 辛工校·河南人民出版社

34

(豫)新登字 01 号

尼 赫 鲁 家 书

庞新华译 辛工校 责任编辑 隅人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铁路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字数 445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7—215—02358—3/I·281 定价 14.60 元

前 言

英迪拉·甘地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作为首相她主宰印度命运十六年。她智慧超群，洞察入微，对人民深切理解，对问题明察秋毫，尤其关注下层穷苦民众的生活。她对自然和艺术具有天才的敏感。这些特点形成了她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体魄以及完美的道德追求。然而尽管她成就枚不胜数，在历史上地位超然，她也是一个人，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造成不少误解。十分了解她的人知道，她是一位可爱的、非常关心别人的人。

这里收集的英迪拉·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间的通信，时间为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九年，表现了父女之间的种种联系与交流。这些书信使人从另外一些角度观察英迪拉·甘地的特点和个性，以及它们是如何从早期就开始形成和发展的。

为了全面地理解这些信件，有必要对英迪拉的家庭作一交代。十八世纪尼赫鲁家族从克什米尔移居德里市；祖父服务于莫卧儿法庭。在一八五七年起义，也即是闻名的印度叛乱中，他们的产业遭到损害，被迫栖居亚哥拉，之后搬到堪普尔，最后定居阿拉哈巴德。英迪拉·甘地的祖父莫帝拉尔·尼赫鲁，作为律师和民族主义者赢得了显赫地位。他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后在海罗和

剑桥求学，并在内殿法学会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律师的职业似乎并没有吸引他，当时国内的狂风暴雨则更使他向往。他开始参加政治集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安妮·博桑特发起的自治联盟的地方支部在阿拉哈巴德成立之时，他立即投入了印度民族主义最有力的宣示运动之中。

一九一六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卡玛拉·考尔结婚。像尼赫鲁家族一样，考尔家族也是克什米尔人。虽然不像莫帝拉尔的成功给他的家庭带来社会名望一样，但他们在当地也颇受尊重。到阿南德巴万时，卡玛拉·尼赫鲁十七岁。比起西方文化色彩浓厚的婆家，她的家庭的文化环境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这就需要新娘子很大程度上的适应这一环境。然而，卡玛拉具有了了不起的内在潜力和能量。她和丈夫之间逐渐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和理解。她英年早逝。尼赫鲁对她的感情表达在他的自传中，他把自传“献给逝世的卡玛拉”。

对于这个家族的描述如果不着墨于莫帝拉尔·尼赫鲁就不会完整。对于外界来说，莫帝拉尔·尼赫鲁是公共的英雄人物，他的律师职业以及在民族主义斗争中的地位使他赢得了印度极少数人才拥有的位置。对于家庭来说，他是一位可爱的丈夫，一位溺爱儿子贾瓦哈拉尔和女儿维加亚·拉克西米和克里希那的父亲。

一九一七年第一个孙女的出生给莫帝拉尔带来无限欢乐。“这个女孩儿比一千个孙子还要宝贵，”他自豪地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小小的英迪拉在他的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莫帝拉尔·尼赫鲁的妻子索拉普·拉妮，英迪拉称之为“多尔阿妈”，以及贾瓦哈拉尔的两个妹妹是这个大家庭的另外几位成员。

在英迪拉·普王雅达西尼(她的父亲这么叫她)还小的时候，这个家庭受到了穆哈特马·甘地的影响。这使他们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敏感而好奇的独生女英迪拉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即她的父亲，祖父和母亲可能会突然被长期带走到“另外的家”——

监狱去。幸运的是,即使在这样的事件之中,亦不乏家庭成员之间由关切之情蕴酿而成的书面交流和对话,这对于形成英迪拉的个性具有强大影响作用。这种交流来自于感情的纽带,而这种纽带是印度的家庭关系的显著特征。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坚信他的女儿应该在增强她的批评能力和拓宽她的知识兴趣的环境中成长。他认为,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得到的自由教育是形成青年人思想可靠基础。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和对于女儿的关心,促使他就世界历史给女儿写了一系列的信。这些信后来结集成书为《世界历史概览》。

英迪拉·甘地成长于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家庭,参与公共生活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使命,这一事实给她灌输了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强烈意识。二十年代初期,穆哈特马·甘地发动了“沙提亚格拉哈”,即不合作运动,反抗英国政府。就在这个时候,刚才提到的逮捕事件首次发生在阿南德巴万。国大党的政策是不付英国政府的罚金。结果,警察不断光顾这座房子,拿走贵重的物品兑现罚金。英迪拉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周围的动静。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她的家庭牺牲了财产和舒适。年幼的她目睹了这一切,并把这些记在心里。从她五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中可以略知她是多么坚定地参与任何与争取自由有关的活动。作为抵制外国纺织品的一部分,莫帝拉尔和贾瓦哈拉尔决定烧掉阿南德巴万中进口的衣物和布料。英迪拉请她的父亲允许她也去。贾瓦哈拉尔没有允许,因为火在深夜才点燃,那该是孩子们睡觉的时间。然而她坚持己见。“我没有睡,跑到了祖父身边,”她后来回忆道。“我告诉他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去看大火。”他答应带她去。莫帝拉尔·尼赫鲁大概从孙女的性格中看到了自己坚定意志的影子。

一九二六年贾瓦哈拉尔、卡玛拉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与英迪拉一起去欧洲旅行。经过一段旅行之后,贾瓦哈拉尔认为应当让九岁的女儿入日内瓦的国际学校上学,后来又回到附近的柏克斯城的新

学校就读。后者由海默琳女士开办。海默琳女士暮年时，回忆起她的学生，讲到解放印度的运动给这个孩子所留下的印记：

她以胜利的微笑招呼每一个人，在同伴中很有威望……英迪拉对于自己的国家有清晰的认识，并决心把她从外国力量中解脱出来……

她常常提到甘地的名字……她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冒生命的危险去绝食，非暴力抵抗为何比仇恨或武器更有力量……英迪拉·尼赫鲁描绘的甘地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①

英迪拉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所接受的政治教育，因经历了三十年代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后一阶段而得到加强。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任主席的国大党一九二九年做出的决议起到引爆作用。自由斗争的目标被定义为普尔纳索拉吉——完全独立，以反对国大党中一部分人所支持的自治领地位。后来她自豪地回忆到，她的父亲曾让她给他朗读由他本人起草的《独立宣言》，她当时是多么的激动。

英迪拉的早期教育是非正统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九三一年决定把她送到孟买附近普那城里的“学生自己的学校”。学校由年轻的瓦齐尔夫妇开办，目的是培养孩子们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英迪拉在那里三年。像在柏克斯的学校里一样，她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对她的信心以及乐于助人的风格留下极深的印象。在学校时她就对于领导有独到见解。英迪拉是沙提雅·沙巴，即文学社的主席；是学校杂志的编辑；是校委会的“首席法官”。三十年代初期

^① 摘自《印度的精神》，第一卷，孟买，一九七五年。

她在普那写的信满是时事的记录，显示了这些事件对她的影响。一九三二年九月，被囚禁于普那附近叶拉乌达监狱里的穆哈特马·甘地，决心绝食至死，以抗议英国企图在贱民区规定单独的选举身份。英迪拉给父亲写道：

九月二十日巴甫开始绝食的时候，我们也都在这里绝食并进行祈祷。学校又进来一个新学生。当然几乎每周都有新生进校，但这一位是新型的，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你能猜出她是谁吗？她是我们的莫哈特拉尼——贱民的女儿。当然她是免费上学……她五岁了，名字叫乌拉，但我们把它改为乌尔瓦西……

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九三二年九月的历史性绝食的时候，她是多么强烈地分担他的痛苦。她给父亲写下那一天的记录。

巴甫看来很高兴，当然身体也比昨天好多了。昨天情况真糟，医生们都很着急。

她还给父亲写下中断绝食的情况：

中午时分主管人告诉我们好消息，说电报正在来普那的路上。帕德马加、妈咪和我跑到市场上，买了能买到的最好的橘子和其它水果。我们回来后，看还有一段时间电报才来，便开始等待，每一分钟就像一个小时。电报终于来了，巴甫说他不愿意放弃绝食，直到阿木白德卡医生听到了电报内容并同意为止。阿木白德卡医生在孟买，他来这里要花很长时间。已接近五点了，六点之后巴甫什么

也没吃。因此每个人，包括泰戈尔医生和监狱当局，都劝他不要等阿木白德卡医生。因此我立即给他准备了两个橘子。之后，泰戈尔医生唱了一首孟加拉歌曲，阿西拉姆的人们唱起巴甫喜欢的巴建歌曲。后来巴甫喝了橘汁，并给每个人发了水果和糖块，像帕沙德一样。经过一天焦急之后，我们才高兴地回到家。

今天我特别高兴，我想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中最高兴的一天。这是巴甫六十岁生日，他开始吃水果了，也比以前好多了。

英迪拉在普那的学习结束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决定把她送到孟加拉的山蒂尼克坦。诗人拉宾德拉那思·泰戈尔创办了一个独特的学术中心，集中天才的学者和艺术家们传授知识。他们鼓励学生探索周围的知识和艺术世界。拉·泰戈尔是英迪拉灵感的源泉，对她的影响难以估量。

她一到达那里就写道：

我最好说说对这个地方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还仅仅看了宿舍和办公室，图书馆和卡拉巴万只是走马观花。一切都是那么艺术化，美丽，狂放。

英迪拉在山蒂尼克坦的经历丰富了她的见识，并改变了她。后来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我很高兴在山蒂尼克坦上学——主要是因为格鲁德乌。在那种氛围中，他的精神似乎漂浮于每个人的头上，跟随着你，以慈爱的目光注视着你。我感到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生活和思想……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九次被捕，在各种监狱囚禁十年。在监狱里，与所爱的亲人隔离的痛苦，在道德和心理上给他造成深深的创伤。一九三三年他从监狱给英迪拉写信说：“普里雅达西尼，悦目的人，虽然见不到，但是更亲切！”

而他不在时，英迪拉写的信同样令人感动：

自从今天清晨我们都一直焦急地等待你的信……但是邮递员来了，我们非常地失望。然而我希望信很快就会来——大概明天吧……

很快就是你的生日了——十四日……我会整天思念你。当然我永远思念你——但那一天会更加思念你。

一九三四年，卡玛拉的健康突然恶化。因此英迪拉不得不中断在山蒂尼克坦的学习。卡玛拉二十年代早期身体就不好，但一九二六年欧洲的一段疗程对她帮助甚大。由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监狱，英迪拉陪伴母亲住进喜马拉雅山中包瓦利的医院。稍后，她与卡玛拉接受医生们的建议，一起赴德国巴登威勒治疗。在巴登威勒，卡玛拉的病情非常严重，监狱也释放了贾·尼赫鲁使他能够到妻子的身边。关于英迪拉照顾病重的母亲，有一段动人的描述：

英迪拉总是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她的母亲在生与死中挣扎。母亲与女儿之间似乎有一个紧密的联系，她们的眼睛说着同一种语言，勇气与悲哀的语言。

之后不久，一九三六年二月，卡玛拉的去世对于英迪拉和贾瓦哈拉尔是一场巨大悲剧。贾瓦哈拉尔把女儿留在欧洲继续学习，自己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到印度，把骨灰沉入恒河中。好像有过默契，

他们的信没有提及卡玛拉，但贾瓦哈拉尔谈到了突然降临在他身上的真正的孤独：

我住在阿南德巴万，除在办公室以外，形单影只，自做自吃，一人工作。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与你的房间连接的门常常开着。夜里，有时是白天，我走进你的房间，环顾四周，向它说声晚安。你的影子似乎漂游在房间里，我不喜欢有任何的打扰。各种各样的零星东西一如你走时那样，使人感觉到刚才还有人住过……

你的信讲述了你满是活动和工作，也满是欢乐的生活，我太高兴了。你的语言掀开了我的脑海中无数画面，过去的记忆一串串闪现眼前，因而这座沉寂的房中空虚的感觉离我而去。不然它会是

孤独的房子，
蜥蜴在歌唱；
掏空的墙头，
老鼠在徜徉。

一九三七年，英迪拉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从欧洲回到阿南德巴万。现在她已是成熟的少女，有自己的知识兴趣和感情寄托，反映了她个性发展的新阶段。来自同一城市的青年政治活动家佛罗兹·甘地，非常喜欢英迪拉。她接受了他的挚情。这个家庭都熟悉他，尤其是他最崇拜的质朴正直的卡玛拉曾对他更为熟悉。在印度几个月之后，英迪拉急切盼望回到英国继续学业。佛罗兹也在伦敦留学。从孟买与她一道启程的牛津同学给我们留下了对英迪拉的描绘。当她们登上印度总督号轮船时，卡米拉·提步吉看到：

我伤心地流泪……而英迪拉却异常平静。这是我第

一次领略她早年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坚韧不拔的训练，以及家庭因激烈地参与独立斗争给她造成的吞咽痛苦和无比的坚强。分别对她已习以为常。我们肩并肩站着，挥着手，船渐渐启航；她非常地克制，而我却不知道如何对待成串的泪珠……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在牛津的短暂学习生活极大地刺激了英迪拉的求知欲。牛津与山蒂尼克坦的风格迥然不同。在山蒂尼克坦她从拉·泰戈尔膝下获得对印度传统文化的理解，而牛津的生活则拓宽了她的视野。在英国，她与具有民主激进和左翼观点的人建立了联系。在牛津的印度学生完全卷入三十年代后期的政治漩涡中，特别是通过印度学生会，它提供了辩论当时政治大事的讲坛。然而英迪拉的活动范围比大多数学生更为广泛。激进民族主义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伟大崇拜者 V·K·克里希那·梅农着意培养她，并让她在伦敦参与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

她从牛津给父亲写信说：

……我与 H·A·L·费歇一起喝茶。他真和蔼，他的妻子也出奇地迷人——似乎我在哪里见到过她。那里还有一些新学院的学生……太愉快了。之后与赖斯·大卫斯夫人以及学生会执委一块儿吃饭——而后举行学生会会议，赖斯·大卫斯夫人讲了话。哎，我忘了上封信是否告诉你我已成为学生会女生秘书……

……我想我已告诉你在牛津我只参加两个社团——印度学生会和大学劳动俱乐部。在劳动俱乐部各种观点纷呈，但并不隶属工党。但两天后是县政选举，我们还希望工党候选人能选上。我出去游说了一夜，昨天又花一个

小时叠信，给选举致词填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本来比较羸弱的英迪拉，身体开始生病，她不得不又一次中断学业。她被送到瑞士雷辛的医院去治疗胸膜炎。离开了朋友们，离开了学院，一种浓烈的沮丧情绪包围着她。然而她坚定地与疾病斗争。随着欧洲政治形势的恶化，英迪拉决定回印度。在自己的未来以及世界的未来都不安定的气氛之中，她开始计划自己的归程。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危险关头，她的从容气质依旧跃然纸上。她给父亲写信说：

于是我把钱留下了——以备回印度的路上用，而那时从英国取钱将是困难的。我告诉你这一点，目的在于你可以索要这笔钱——如果（这是很不可能的，但防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没有理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库克公司。

在英国学习期间，英迪拉·尼赫鲁对世界政治形势很感兴趣。牛津的青年人紧跟两大对立的政治和社会流派：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她正是这群青年中的一员。英迪拉以激进的观点看待世界政治，导致与父亲出现分歧。她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九四〇年所写的关于苏联问题的文章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我在读《民族论坛》上你的关于俄国和芬兰战争的文章……对于苏德条约和芬兰战争你似乎同样感到震惊。然而两者的责任不完全起源于八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吗？在慕尼黑，英国和法国已明确表示站在哪一边。俄国在它的集体安全政策失败以后，它退缩到李特维诺夫以前的隔离状态，它的主要忧虑是怎样脱身于即将来临的欧洲战争（后来进军波罗的海）。苏德条约当然不是前线

的变化，因为德国要求的无外乎俄国继续保持隔离状态。条约对苏联谴责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没有丝毫影响——从莫洛托夫十一月的演讲和国际共产主义关于目前战争的宣言可以看出。至于芬兰，你同意苏联的要求是正当的。那么，为什么战争对于你还是一场震惊的事件？在盟国的唆使下，苏联的要求被拒绝以后，你是否期望苏联袖手旁观一言不发，直到整个战争直接对准它？这些正是——现在仍然是——盟国的意图，也正是英国报界竭力掩饰的……

英迪拉花了几个月时间才从瑞士到达伦敦，又花了几个月才得以绕好望角踏上回印度的旅途。一九四一年四月她到达阿拉哈巴德。此时她二十多岁，弗罗兹·甘地和英迪拉决定结婚。由于不同的背景，想到这样一个非传统的结合，贾瓦哈拉尔感到困扰。起初他对这个提议反应是消极的。然而一旦他意识到这两个青年人之间的感情多么深厚，他立即同意了。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英迪拉·尼赫鲁和弗罗兹·甘地在阿拉哈巴德结婚。英迪拉的姑姑，克里希那·胡第兴夫人，留下了关于婚礼的感人记录：

本来就美丽的她，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比任何时候更美丽，然而身体纤弱，几乎是轻飘飘的。她笑着和周围的人谈话，但她黑亮的大眼睛不时黯淡下来，往远处悲伤地观望。什么样的乌云能遮掩这个幸福的日子？是否由于渴望已去世的年轻的母亲，她的离去所留下的空白至今仍未有填补？拟或是想到了要离开慈爱的父亲？而她一直是父亲的命根子啊！

结婚之后，夫妇到克什米尔旅行，但政治斗争的激化使他们不

得不很快回到阿拉哈巴德。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已清楚表明不允许印度自治。一九四二年八月，通过“免除印度”决议之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印度所有著名的政治领导人一起被关进监狱。英迪拉·甘地也于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捕。在耐尼中央监狱，她致力于大量阅读和照顾同室犯人，其中有一个孩子，是难友的女儿。监狱的生活也给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有很多令她兴奋的时间观察狱中的植物、树木和鸟类：

不论石砌的墙头和铁丝网给人造成多么大的区别，我们还是感谢它们没有给蔬菜王国构成任何阻碍，年复一年，不论战争与和平，蔬菜总是随季节生长。我们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这棵树如果要靠人们的夸奖与好恶去生活的话，它也许早就枯萎了。然而它不理睬我们的嘲笑，傲然地走自己的路。现在法尔根季节又来了，去年的老树皮还剩下几片屈指可数，年老泛黄，正在剥落，光秃的树枝正披上夕阳的红装。树枝上好像抹上了一层彩霞，像害羞的脸。真是美得惊人。但是春天不能持久，很快，夏天就会把这一层红装变换成厚厚的更有用的绿装。

一九四三年英迪拉·甘地从狱中获释，而她的父亲还要在狱中度过漫长的三年。释放之后，她不停地给父亲写信，告诉他外界发生的事情。不久她就告诉了他即将做母亲的欢乐。为此她到孟买与姑姑住在一起。五月份她在马斯朗给父亲写信：

在小姑那里我把所有关于婴幼儿的书籍全部收集起来并带到这里。把一个新人带到这个世界上，并负有完全控制他的生活的责任，这使我好害怕……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英迪拉生下儿子拉吉夫。在给仍在狱中的父亲的信中，她的语言充满着激动和满足，她仔细地观察孩子的迅速成长，看到孩子日渐提高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她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信：

独立日——我们像平常一样在家中举行升旗仪式。
拉吉夫帮助我扶着旗杆！他还用奇怪的腔调跟我们唱升旗歌呢……

贾瓦哈拉尔仍在监狱期间，英迪拉与父亲的通信依然反映了个人感情和公共事务。一九四五年尼赫鲁获释。之后不久尼赫鲁在英国政府和印度领导人举行的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一九四六年英国组成过渡政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成为独立印度的事实上的首席执政。这个阶段，英迪拉·甘地的时间，一半在勒克脑的家里，一半在德里父亲的家里。同年十二月，第二个儿子山吉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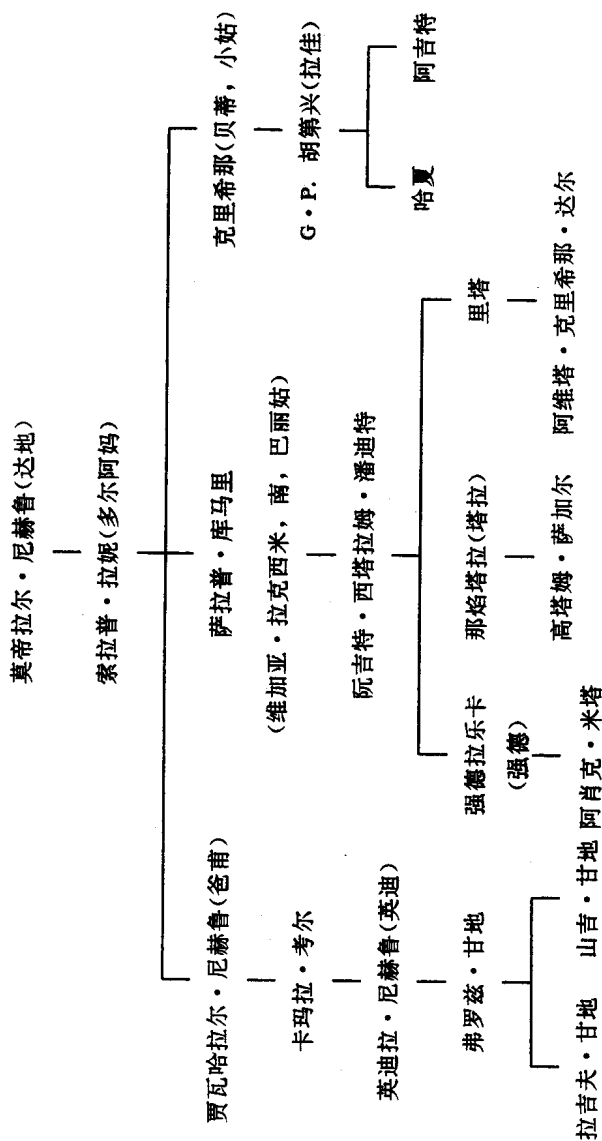
后来十七年，英迪拉·甘地为父亲承担了官方女主人的职责。此时父女之间的交流多是以言语进行了，除了英迪拉有时离开德里短期休假，或在国内外旅行之外。这里我们还有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四年之间的一些信件，使我们看到英迪拉·甘地在政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克什米尔休假，或与普通市民和组织（大多数与儿童福利有关）一起工作，她都以非常的敏感把国家的政治气候和不同社会背景人士的观点，传达给她的父亲。

信是纸上的对话——但更具表现力。英迪拉·甘地的内向以及个人意识使她在纸上比面对面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她的写作，尤其是后来的写作更为透彻和明晰。

在一位著名政治家兼作家与一位性格难以驾驭的、成长中的女儿之间来往的这些信件，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曾给印度和世界历史留下如此印痕的两个人。

索妮娅·甘地

尼赫鲁家谱



(此处仅译出与本书有关的部分)